

日本近现代文学

作品选析

高 宁 韩小龙 主编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日本近现代文学

作品选析

高 宁 韩小龙 主编

H369.4
110

2004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选析 / 高宁, 韩小龙 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ISBN 7-81095-360-5

I. 日… II. ①高… ②韩… III. 现代文学—文学
评论—日本—研究生—教材 IV. I31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1021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江龙娣

印 刷: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371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 第 1 版 2006 年 7 月 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95-360-5 / I · 016

定 价: 18.8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序 文

为硕士研究生开了十余年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课程,总觉得手头缺少好的文学选读教材。挑了理论性强的论著会有空泛之感,选了难度相当的文学原著又会不知不觉地把课时耗在指导学生读解上。作为本科文学教材的继续,我觉得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研究能力有待提高,创新精神亟须开发,论文的观点、构思的形成,说理、论证的方法应强化指导。因此,硕士研究生阶段只强调读解不重视研究能力培养的做法或只注重研究理论而忽视实践的做法,都不利于更好地培养基础扎实、有研究能力和创新思维的人才。

我赞赏本教材编选者的思考。在对以往已经出版的各类文学选读教材的长短优劣悉心研究、深入考量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本教材的编选方针,既考虑到学生的层次、培养目的,又明确区分了本教材与精读教材、本科阶段文学教材的不同。编选者煞费苦心地从近十年国内研究的文学论文中选出与短篇原件有关的论文,让使用本教材的教师和学生有一个讨论和批评的平台,从而诱导学生更多地关心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方法及其作家评论。这无疑是本教材的一个亮点。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正大力组织编写各种层次的外语教材,为切实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有志于编撰各种日语语言文学教材的设想也越来越多,这预示着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的

繁荣。即使以同一门类为研究对象而编写的教材,这一册与那一册、这一套与那一套也不至于只有一致性而无差别性。只要对某一种教材作过认真细致的调研,艰苦精心而又愉快地准备,即便是同类教材,也一定会避免选题的重复,体现出编选者的新意。凡是富有个性的编撰活动,都有可能产生既有独创性又受到师生欢迎的成果。尽管一切教材的编写活动总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任何教材的特长与局限总是同时存在的,但是,我们热爱外语教育事业的教授们一定会尽可能地使编撰教材的工作成为培养教育功臣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

期盼本教材在日语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上海外国语大学

谭晶华

2004年6月15日

目 录

代前言

试论中日教科书里的日本二战小说

——从文学批评的历史把握谈起 … 高 宁 韩小龙 (1)

第一讲

舞姬 森鷗外 (18)

《舞姬》研究史简述 高 宁 (41)

试评《舞姬》的主题思想与人物塑造

——从文学批评的历史把握谈起 高 宁 (44)

第二讲

花火 永井荷風 (54)

《焰火》研究史简述 高 宁 (63)

漫谈永井荷风文学的思想倾向 谭晶华 (66)

第三讲

地獄変 芥川龍之介 (75)

《地獄变》研究史简述 韩小龙 (113)

试论芥川龙之介的《地獄变》

——以画师良秀为中心 韩小龙 (116)

第四讲

- 伊豆の踊子 川端康成 (126)
《伊豆的舞女》研究史简述 高 宁 (154)
《伊豆舞女》论 李德纯 (157)

第五讲

- 冬の蠅 梶井基次郎 (169)
《冬蝇》研究史简述 李晓光 (183)
试论纯文本解读与文化语境解读之不同韵味
——以梶井基次郎《冬蝇》为例 李晓光 (186)

第六讲

- 白痴 坂口安吾 (201)
《白痴》研究史简述 黄 芳 (232)
“肉体”与“精神”
——解读《白痴》 黄 芳 (235)

第七讲

- 小僧の神様 志贺直哉 (248)
《学徒的神仙》研究史简述 韩小龙 (259)
论志贺直哉《学徒的神仙》与人道之爱的艺术性
..... 刘立善 (261)

第八讲

- 松葉杖の男 遠藤周作 (269)
《架着双拐的人》研究史简述 董 安 (291)
架在心灵上的“双拐” 董 安 (294)

第九讲

- 赤い蔦 安部公房 (304)
《红茧》研究史简述 高 宁 (308)
存在的困境与疏离的隐喻——《红茧》 邹 波 (311)

第十讲

- 水滴 目取真俊 (318)
《水滴》研究史简述 高 宁 (349)
用文学传递冲绳的声音
——评目取真俊的短篇小说《水滴》 王 成 (352)

第十一讲

- 象の消滅 村上春樹 (363)
《象的失踪》研究史简述 黄珺亮 (388)
消失与寻觅
——关于村上春树《象的失踪》 林少华 (391)

第十二讲

- 家族写真 辻原登 (394)
《全家照》研究史简述 韩小龙 (406)
隐蔽与显露
——读辻原登的《全家照》 韩小龙 (409)

- 后记 (416)

代前言

试论中日教科书里的日本二战小说

——从文学批评的历史把握谈起

高 宁 韩小龙

二战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然而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中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在日本,从政府机构、司法机关到大专院校,一股无视事实、否定历史的逆流就像一眼间歇泉,或暗流涌动,或恣意喷发。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少数日本人否认、篡改历史的做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认识之中也并非没有盲点。其中最大的盲点就潜藏于日本文学的教学研究领域。本文仅以日本国语课本和国内日本文学教科书中的二战小说为例进行一个粗浅的考察研究。

—

先看日本的国语课本。按其所选二战小说的性质,大致可分3类。

(1)以美军对日本的轰炸和核爆炸为主要描写内容的作品。此类小说有:野坂昭如的《随风飘去的妈妈》和原民喜描写核爆炸

的短篇《夏天的花》等。前者见于三省堂 1997 年出版发行的《现代国语 3》，后者为国语教材的“保留节目”。野坂昭如描写了一对为躲避美军轰炸，在火海边先后被烤干丧生的母子。开篇第一句为“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整个故事则发生在 10 天前美军对“既没有工厂又没有军事基地，略微有点拥挤的住宅区”的轰炸。为了小孩不被咫尺之外的熊熊大火烤干，母亲先后用汗液、眼泪和拼命挤出来的乳液抹在早已断奶的孩子身上。最后，她榨干了身上所有的水分，化作一帧风筝飘然飞上天去，她的小孩也在一番求生之后羽化而成仙。原民喜讲述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惨不忍睹的情景和日本人民对核战争的满腔仇恨，它被节选进中学国语课本达 10 年之久。同样表现广岛核爆炸的井伏鱒二长篇小说《黑雨》自 1975 年起也一直被节选进中学国语课本^[1(p217~235)]。

(2) 以战时、战后日本人的悲惨生活和精神创伤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作品。1997 年三省堂《现代国语 2》选入佐江众一的《哥哥的明信片》。作品描写战后日本的一个家庭围绕战死在冲绳的儿子所发生的故事。小说层次分明，从盼子平安回家，到最终接到遗骨，把一家人，尤其是做母亲的心理变化刻画得栩栩如生。山川方夫的《夏天的葬礼》被收录进学校图书株式会社 1982 年版的《高等学校现代国语一》。小说叙说了主人公战后路过家乡，遇到山芋田里的送葬队伍，从而回忆起往事的故事。十几年前，主人公由于自己贪生怕死，硬是把前来保护他的“女英雄”广子^①气走，让她倒在敌机的扫射中。之后他一直心怀内疚，没有勇气回家。当他终于从揪心的回忆中走出，准备埋葬掉那一段痛苦时光时，却不想又遇见送葬的队伍，而且死者的照片又是那么眼熟。通过与送葬队伍中孩童的交谈，他的心情几起几落，最后得知死去的正是当年的广子。她被敌机射中后发疯，终于在几天前自杀身亡。

(3) 以亚洲各国为小说时空背景的作品。此类作品有角川书店 1981 年版《现代国语 3》选用的武田泰淳的《坏家伙》。它讲述

了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主人公通晓汉语，先后从杭州转战到汉口，从保卫卫生材料厂分厂到守护战地粮库。光村图书、第一学习社、三省堂的高中国语教材收录了大冈升平的《野火》。小说描写了日军当年在菲律宾的生活。主人公因肺病无法归队，也无法住进医院，只好流落在荒山野岭之中。其间，他遇到永松和安田两人，分得一些“猴肉”充饥。后来他发现永松所猎之“猴”竟是路过的单个日本兵。不久，永松、安田矛盾激化，安田被谋杀并成为口中之食。“我”在极度的愤怒中发疯，再也回忆不清之后的“残酷物语”。作家通过人吃人的故事，把战时的血腥拎到了读者眼前，展现出人性中兽性的一面，并对人类的生存意义以及上帝是否能够主宰大地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探讨。此外，大冈升平描写俘虏营生活的《俘虏记》、竹山道雄描述日军缅甸战场的《缅甸的竖琴》、野坂昭如描写少年飞行“特攻队员”的《红蜻蜓和蟑螂》^②等也先后入选国语课本。

那么，我们国内的日本文学教科书^③情况又是如何呢？据笔者的考察，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篇目和日本教材相同。如《随风飘去的妈妈》入选《日本文学》；《黑雨》被节选进《日本文学作品选读》；《野火》被分别收入《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文学作品选读》、《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和《日本近现代文学阅读与鉴赏》。不过，第一本选载了前3节和后12节，其中包括小说中描写人吃人的部分；第二本选用了第一、四、五节；第三本选用了最后3节；第四本选用了前7节。原民喜的《夏天的花》入选《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选读》。

二是选用了一批日本国语教材从未用过的二战作品，如《遥拜队长》、《脸上的红月亮》等。前者花开四度，后者入选三本教材之中^④。《遥拜队长》描写了一名退伍军人战后仍旧生活在疯狂的战争岁月的幻觉中，言谈举止十分异常，动辄就要面对东方向天皇朝拜，成为让人们既可嫌又可怜的对象。《脸上的红月亮》着重描写

的是战争带给日本人的心灵损伤和战争环境下人的道德问题。在菲律宾战场上,主人公时而“想象着母亲在空袭中被烧死的情景”,时而思索“难道就是为了叫人认识爱情的价值,才需要打一场使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战争吗”?战后回到东京,却因为心灵的战争创伤而无法和心中的恋人走到一起。石川淳的《废墟上的耶稣》入选《日本近现代文学选读》,主要描写了一位“驰骋”于战后日本废墟上的无赖少年,以试图探讨战后日本人的生存方式。宫本百合子反映战后生活的长篇《播州平原》最后一章被选入《日本近现代文学阅读与鉴赏》。

二

但是,当我们拨开小说的具体情节,站在历史的高度分析研究上述作品时,就不难发现中日两国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误读。小说误读了历史,而对小说的编选又产生了双重误读:无法认清小说真实意蕴的误读和被小说引导的对历史的误读。先看日本。

简言之,日本二战作品在历史认识上存在不小的偏差,在客观上有模糊战争性质之嫌。其最大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狭隘的爱国主义。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把话语集中在日本人身,主人公自不待说,其他主要人物也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日本人。甚至背景是日本国外的作品也是如此。作家所关注的,在国家的层面上,只有日本;在人性层面上,也只剩下日本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是不在视线范围之内的。因此,于前者他们只看到战争带给日本及其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灾难;于后者,他们仅仅描绘了战争对日本人自身的人性摧残及其扭曲、变形与异化。在这种情景下,绝大部分作家对战争的思考、反省和指责就流于单方面的辩解,缺乏足够的深度,并在客观上成为日本战争受害者的代言人。

在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关系上,这类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以被

受害者的身份出现,或者在承认是加害者之后又着重表现其同时也是被害者的一面,并以后者为中心铺陈展开。尤为微妙的是,这些描写战争的作品中几乎从不出现战场的正面描写,甚至很难看到战争地区的普通老百姓。战争一般都是在没有对手的时空中展开。这样一来,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便很难分清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他们为何开战,甚至很难有侵略与被侵略的概念。能看到的,能听到的,除了日本人,还是日本人,而且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人们几乎读不到日本侵略者蹂躏亚洲人民的具体描述,也很难看到与此紧密相关的反省、忏悔和这个意义上远离战争的决心。比如《随风飘去的妈妈》、《夏天的花》、《黑雨》、《俘虏记》等等莫不如此。《坏家伙》的背景虽然是中国,但是全文提及日军对我国农民的暴行,仅有150字左右,整个小说主要讲述的是日本人自己的故事。后来在叙述日本人在粮库监守自盗的情节里出现了中国人。但是,他却是没名没姓、没有来历的小商人。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出场,不过是为了体现日本军人道德意识丧失,他不过是一个道具。比如,主人公及其伙伴在不明白这位购买者的身份,甚至怀疑是敌军采购员的情况下仍然为一己之私利,大肆倒卖库粮。作家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主人公“我”与三个坏家伙的微妙关系的处理上,着力描写“我”的内心世界的每一细微变化,探讨好人和坏人的界限与转变问题。山川方夫的《夏天的葬礼》虽然在人性批判上不乏特点,但由于作家回避了战争的前因后果和时代背景,结果使得对美军轰炸的控诉和日本人的满腔民族仇恨成为作品的主旋律。这无疑削弱了作品的深度。《哥哥的明信片》实际上也是典型的“大背景下的小故事”,小说最后甚至把“哥哥”的遗言推成小说的高潮——“待机任务已经结束,出征椰子茂密的南方(即南洋)本是男儿的夙愿。我作为皇军的一员发誓绝不让自己蒙受耻辱”。《俘虏记》的关键部分是士兵的回忆,即他为什么在被捕前不向一个漫不经心走向自己的美国兵开枪。单独地看这部作品,应

该说,这个设计还是相当不错的,作家以此为线索把日本兵复杂的求生心态刻画得相当鲜明突出。但问题是,不开枪只是个别事例,开枪才是战场上的真实。描写不开枪以及其前后心态的变化发展固然有文学的审美价值,但是,描写开枪也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还带有历史的普遍意义。然而,在其他作品中人们也只能看到类似不开枪的情节,而见不到“开枪”的描写。日本作家避重就轻之嫌由此可知。《缅甸的竖琴》、《红蜻蜓和蟑螂》也颇具这方面的特点。简言之,“日本战后文学的总体倾向,实质上不是反对侵略战争,而是反对‘战败’;不是反省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而是刻意表现日本人本身的受害”^[2(p272)]。当然,如果日本还存在着对战争全面反省、客观公正的反战作品,如果日本作家确实在追究战争责任、引导人民进行反思方面做出了应有的努力,那么这类以日本、日本人为受害对象的作品也完全有理由存在,因为它们反映了即便战争发动者,它的人民也备受伤害的历史事实。它们也能够让读者去思考战争的起因和性质等重大问题。但是,当绝大部分作品都如出一辙,尤其是国语教科书里的二战小说全都讲述着大同小异的“皇天之下”的悲剧故事时,就不能单纯地从审美角度进行阅读、评价。

从理论上说,这些作品所描绘的不过是局部的生活真实,既谈不上现实真实,更谈不上历史真实。这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生活的简单描摹,就像镜子对物体的写照,即便没有产生虚像,没有歪曲生活本身,它也不是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对生活进行提炼、概括、比较,并能够反映生活内在本质与规律的现实真实,当然就更不是艺术论上能够准确、客观反映相当一段长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轨迹,给人以认识论启迪的历史真实了。一言以蔽之,它的特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让二战成为脱离具体时空,且只对日本产生某种伤害的虚幻战争;或者说它又有点像迷宫,让读者在里面绕来绕去,却从不给他们机会来鸟瞰它的全貌,了解其奥妙所

在。作品所能告诉读者的只有形而下的对战争控诉,而不能引导读者形而上地反思战争。所以,一旦回到历史大舞台上,它的偏颇之处、矫饰之处便一览无余。概而言之,“文学需要审美的真实,也需要认识的真理”;“艺术真理,对作家来说,仍然是面对人生的发现过程,概括过程,提炼过程,而不是个人的随意的、偶然的、一点主观的感受和想法”^[3(p183,196)]。当然,如果日本作家能够像汉娜·阿伦特那样超越民族界限,探讨普通人何以犯下杀人罪的心理轨迹,那么,即便不将批评的矛头对准日本或日本人,也无可厚非。从这个角度说,《坏家伙》、《俘虏记》和《野火》似乎有这么一点意思,却没有朝这个方向深挖下去。相反,作家之笔更多地指向了人性中善的一面或善恶相克的一面。对人性负面的追究也就消解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笔法之中。

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又会发现真正可以算得上反战作品的小说却一篇也没有收入,如堀田善卫的《时间》、武田泰淳的《审判》、远藤周作的《架着双拐的人》以及五味川纯平、本多胜一、森村诚一和小林宏等人的作品^[2(p287~293)]。从中不难看出教材编著者对二战和二战小说的看法以及由此而生的取舍标准。三省堂的教师用书在分析《夏天的花》的主题时说:

“作品通过对化为核爆废墟的广岛及其人民地狱般苟延残喘的痛苦生活的描写,展现了拯救未来人类的主题。换个角度,其主题也可以说是核爆幸存者对死者的挽歌和人们对惨痛无比的战争的愤怒。总之,作品对这场愚蠢的战争表达了巨大的愤怒和悲伤……”^[4(p199)]。

很显然,关于这场战争本身的是非曲直被巧妙地回避掉了。由此不难理解我国政府2001年在支持广岛和平集会的同时,不忘敦促日本政府拿出实际行动的做法。然而,在选择外国文学作品时,他们的标准又和选择本国作品截然不同,如光村图书1980年出版的《中等新国语二》就收入了《安妮日记》,并在正文前后附上

背景说明。选文也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这位犹太少女的天真、苦闷、恐慌和被扼杀的爱情,读之令人扼腕长叹,百感交集。另一个让人玩味的例子是都德的《最后一课》。从1927年至1986年,它一直被选入国语教材,之后却从课堂上彻底销声匿迹。原因是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名篇。“据日本学者考证,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省虽然于1871年普法战争后割让给了普鲁士,但是,它原本属于德国,是法国人1697年根据赖斯韦克条约从德国手中夺得了它的所有权”^[5(p92~93)]。这个例子颇具讽刺意味,不仅微妙地折射出日本人在爱国主义上的双重标准,同时又从反面提醒我们编著教材必须要有历史的视角。

当然,讨论再深入下去的话,话题必然落到日本文学研究方法论上。我们不反对从具体作品做起的微观研究,也承认孤立地阅读上述某些作品会觉得它们相当不错。但是,在看到森林之前,就已经完全被单个的树木所吸引,文学误读则难以避免。人们会以为所读到的就是历史的全部真实。尤其对青年学生来说,则更容易如此。所以,为他们编著教材,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代之以先见森林,后见树木的思路。现如今,有关日本二战小说的个案研究尚未很好地展开,能够利用的成果非常有限,因此,这种先见森林,后见树木的概论性研究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今后,随着后继研究的逐步展开,可以对它进行补充、发展和修正。现在是要让青年学子树立起从历史角度把握日本二战小说的意识。此外,我们也反对日本文学特殊论的说法,即“认为现代日本文学只注重描写美学意义或者所谓人类共同的情感而极少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6(p6)]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地理环境说等。日本二战小说虽然在形式上带有“私小说”的特点,却不难从中看出隐藏其后的作家国家观和战争观,它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印上了历史和社会的烙印。对它们的评价,无疑应以世界人民普遍认可的历史事实为根据。然而,在是否承认日本发动并持续进行十余年侵略

战争这一根本问题上,绝大部分作家在小说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概而言之,“以描写十五年战争为例,不论哪个流派,反战作品的支点都是个人,是人道主义。……作家虽然甚至否定了一切社会文明,谴责了灭绝人性的战争,却并未真正地看清国家、社会文明的阶级属性,未真正分清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本质区别”^[7(p315)]。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德国作家对二战的态度。在具体作家上,可能不宜进行简单的一对一式的对比研究,但是,任何研究,尤其是概论性研究,又都是在研究者自身文化参照系统内进行的,摆脱不了事物间互为参照的宿命,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显性和隐现之分而已。换言之,即便不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日德二战小说研究,也仍然不可能摆脱德国这个潜在的参照系。如果过分强调两者的不可比性而拒不承认这个参照系的存在,是有悖学理的。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的获奖作品《命运无偿》不仅是描写犹太少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生活的佳作,而且作家本人在文坛上声誉日隆也与德国对他的全面支持密不可分,其中包括作品的德译和德国授予他的各种奖项等^[8]。这无形中又一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文化参照系。

三

对我们来说,日本国语教材对二战作品的编选明显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某些民族共性、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那么,作为中国学者,在为国内学子编选教材时就不能缺乏历史意识和历史把握。然而,我们不少教材在对日本二战小说上不同程度地丧失了话语的主动权,于无意识之中放弃了对作品进行全方位的多边历史把握。比如说《遥拜队长》,如果我们的阅读带有较强的历史意识,就会发现作品的许多奇妙之处。首先,主人公摔坏脑袋,变成精神病的起因竟然是日军内部争吵,而非战倒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这个关键细节的设置显然是要回避日军侵略的事实。其结果,不言而